

早 年 往 事

伟 人 的 诞 生

公元 1904 年 8 月 22 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男性婴儿呱呱坠地，悄然降生。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外，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晰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降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着他后来对华夏大地乃至世界局势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诞生和成长的轨迹才成为人们饶有兴趣进行探究的热点。他，就是邓绍昌的长子邓小平。

广安，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位于成都以东二百公里、重庆以北一百公里处。从广安县城到牌坊村，有十公里的路程。邓家老院子跟村里其他农舍相仿，是当时川东北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院子里是一块晾晒谷物用的约莫二百平方米的平坝，屋后是大片苍翠浓密的竹林。夏风吹过，飒飒声中带着阵阵凉意。镌刻在旧居门前由今人马识途撰写的一副长联，对此作了深刻形象的描述。上联是“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

擎”下联是“挽狂澜于既倒 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 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它将人们探究的目光引向更广更深更远的时空。

就像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这个后来名叫邓小平的儿子的降生，使他熊熊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父亲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小平，五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六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十岁时送进全县唯一的高小，十五岁时又送进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十六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小平，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了一条与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仆后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不例外，其东北部地区很早就受到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1911 年夏秋 席卷巴蜀大地的“保路

运动”深刻地波及到广安，邓小平正在就读的北山小学以罢课的形式积极响应。随后，邓绍昌在当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行动。革命形势在全国渐成燎原大火，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国家并未独立统一，人民并未安居乐业。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十五岁的邓小平积极参加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罢课活动。这年夏天，重庆当时的最高学府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开办，为正在苦思国家、民族前途的邓小平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产生了新的憧憬。1920年他和父亲心意相通，说服母亲，迈出了赴法寻求救国真谛的第一步。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在汹涌澎湃、波澜起伏的革命大潮中，邓小平从一个渴求救国救民的热血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他的一生，有着三落三起传奇般的经历。他是求索中外的学子；他是红军时期的播火者；他是立马太行的政治委员；他是淮海大战的总前委书记，他是主政大西南的第一书记；他是身居一线、日理万机的党中央总书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一生和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是重绘世界政治地图的一代伟人。

刻 苦 用 功 的 学 子

邓绍昌对自己的长子格外器重，寄予了深深的厚望。邓小平五岁时，父亲就将他送进私塾发蒙。小小年纪的他也十分自重自爱，知道刻苦用功。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十分能干，知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六岁时，邓小平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母亲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像一个小泥猴般回到家时，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一直保持全勤。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十一岁那年，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二十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中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十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1918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父亲向他提出到重庆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学习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他很快便收

拾好行装，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一百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一百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八十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十六岁。

就这样，经过十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 1920 年 8 月 21 日，和八十多名同学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一张编号为 82409A 的工卡

在法国著名的雷诺汽车厂，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张编号为 82409A 的工卡。工卡上清晰地记着，邓希贤 (Teng Hei Hien) 中国人，1904 年 7 月 12 日(农历)生于四川 住比扬古尔市 (Billancourt) 特拉维西尔街 27 号(27, rue Traversière)。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 76 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朗五生丁。工卡的左下角，贴着邓小平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上面印着 82409A 的编号。

这张工卡，忠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法国的一段勤工俭学的生活。

1920年9月11日怀着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渴望邓小平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八十多名同学在上海登上了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开始了他们到万里以外的世界去学本领，求真理的征程。

这一天狂风四作，大雨滂沱，但年轻的学子们激情似火。透过雨幕中愈发显得苍茫的大海，他们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但现实却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这班学子饱经长达三十九天、三万余里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920年10月19日踏上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战结束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片萧条景象。法国也不例外，通货膨胀，许多工厂相继倒闭关门，失业人数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用勤工来俭学的计划顿成泡影。邓小平和许多同学只能走上一条靠打工来求生存的艰难道路。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和几名川籍同学经介绍在克鲁梭的施耐德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开始了他在法国长达四年多时间的“勤工”生涯。

施耐德工厂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军工厂，包括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当轧钢工。这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工人在摄氏四十多度的车间里，需不停地用长把铁钳挟着几十公斤重的钢条疾跑。每周工作长达五十多个小时，常常还要加夜班，一不小心十分容易被炽热的钢条烫伤、刺伤。这对年仅十六岁、身体尚在发育的邓小平来说，苦不堪言。但使他更难忍受的是资本家的压榨

和欺凌。每天一上工，工头就在身后监督催促。稍有延误，马上招来工头的辱骂叱责。工厂给中国学生的工钱压得极低，每天只有十个法郎。这点钱连吃饭也成问题，邓小平他们常常中午只能就着自来水吃几片面包来充饥。一个月后，邓小平离开了这家工厂。结帐下来，他不仅分文未得，还倒赔了一百多个法郎。

首次勤工俭学的尝试，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久居学堂、第一次踏入社会的邓小平而言，触动很大，获益良多。他不仅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亲身体会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过去在心中无限憧憬的这片美丽富饶、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其斑斓色彩逐渐黯然退去。“生活的痛苦 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 使我直接的或间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若干年后，对这一段生活和感受邓小平是这样进行总结的。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还接触并结识了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赵世炎等人。这一切都为他的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经过一段靠领取每天五个法郎救济金的更加艰难的日子后，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在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哈金森规模较大，有数千工人，据说是当时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专门生产各类橡胶制品。邓小平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制作防雨用的套鞋。

哈金森工厂的厂房据说是由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当邓小平被领进明亮高大的车间时，扑进眼帘的是正在紧张劳动的黄皮肤、白皮肤、棕色皮

肤的各色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原来，此时法国经济已出现转机，哈金森工厂在经历了一段紧缩后，已开始大量招收工人，恢复生产。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来自印度、越南、白俄、智利、波兰等地的许多外籍工人纷纷应召而来。跟施耐德工厂拉钢条的工作相比，这里的制鞋车间属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将鞋底、鞋垫和鞋帮套在木模上，然后用胶水将它们和里衬粘连起来。但这项工作节奏很快，要求眼明手巧，动作干净利索。邓小平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别人一天做十来双鞋，他通常一天能完成二十多双。

但邓小平求学的初衷始终未改。在哈金森攒下一点钱后，他便辞去了制鞋车间的工作，来到夏狄戎求学。但由于学校所收费用太高，他这次依然没能如愿。至此，他试图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梦想终告彻底幻灭。

求学不成，邓小平只好继续打工。在经过一段周折后，他进入了位于巴黎附近比扬古拉尔市的雷诺汽车工厂。雷诺汽车工厂是有着一万多工人的著名大型企业，来自中国的黄皮肤、黑眼睛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最多时曾达到六百多人。他被分配在钳工车间当钳工学徒。这项工作主要是借助锉、钻、铰刀、老虎钳等手工工具对机器进行装配以及机器零部件的修整工作。这是到法国勤工俭学几年来，他所从事的唯一一项带技术性的工作，可以接触到部分图纸和简单的工艺技术。

这时的邓小平，较几年前刚到法国时已成熟了许多。通过几年来现代大企业生产的磨炼和体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法语也变得自如流畅多了。这几年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使他在生活、思想、意志、品德方面都得到了极好的磨炼。

“油 印 博 士”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涯中，邓小平虽然自始至终没能进过几天正规学校，却获得了一个“博士”的雅号。这事说来话长，还得先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说起。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于 1921 年 7 月 1 日建立了对中国革命发生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与之遥相呼应，万里之外的旅法的先进分子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于 1921 年春在法国先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与旅德的小组合组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辖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2 年 8 月 1 日少共创办了她的理论刊物《少年》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刊物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鲁瓦大街 17 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在编辑部里，他最初是从事蜡板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离开工厂后，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他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在刊物里担任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

就吃两片面包 渴了 就喝上几口自来水 困了 就在地铺上稍事歇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接过来刻写、印出一篇。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 彻夜不眠。

小时候刻苦认真的习字和参加这项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他的蜡板总是刻得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匀称工整，美观大方，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 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 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项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

一年半后，《少年》改名为《赤光》由偏重理论宣传转而紧密结合国内革命的实际，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它充分报道了国内国民革命运动的情况及国际劳工运动的消息，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内容，还结合旅法勤工俭学的实际，开展了对国家主义 青年党的严肃斗争。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经过此 一年多时间革命 斗争生活的洗礼 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内不仅刻写、油印、装订等老本行干得更加得心应手 而且还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在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 仅以“希贤”本名发表的就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 先声周报 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等。文如其人 就像《赤光》封面那个手持号角 高擎红旗 正欲跃起的少年一样 邓小平这些文章写得

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比如，在那篇揭露青年党人的文章中，邓小平这样写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他们却歌舞于花都。”他们十月十日所主持的所谓“国庆纪念会”只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底十月十日俱乐会、“跳舞会”，他们却偏说是旅法华人的纪念会。请看，这是何等的捏造，何等的欺骗！的确，这样的文章尖锐有力，入木三分，读来是何等的痛快淋漓！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这中间无疑有着邓小平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邓小平以手中的蜡板、钢笔，作匕首，作投枪，在《少年》、《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

1922年的夏天，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张开双臂，接纳了邓小平。这时他还在蒙达尼哈金森工厂打工，他是和蔡畅等人由蒙达尼专程到巴黎参加入团宣誓的。在入团仪式上，当他举起右手，庄严地自我宣誓时，心情格外的激动。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拉开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辉煌革命生涯的序幕。

1924年，随着国内革命的发展，旅欧的党团员周恩来、赵

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许多人相继应召回国。在 7 月 13 日至 15 日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成员。并因此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这在他的革命征程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成为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后，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积极建设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组织党团员学习，深入到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他们介绍国际和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继续跟国民党右派和“中国青年党”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并成功地发起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活动。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是组织领导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其他各界华人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

1925 年 5 月 30 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和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 商人罢市 如狂飙席卷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各地直接参加运动的多达一千七百万人。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乡村，到处都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怒吼。

消息传到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支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二十八个社团组织在巴黎中心地区举行了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会上，各界代表踊跃发言，强烈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国内人民的正义斗争。会后决定举行旅法华人的示威游行。

邓小平在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又一次拿起蜡版和钢笔刻写了《告示威华人书》等许多传单，号召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政府作直接的示威运动！

法国当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对此进行了极力的阻挠，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制止。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小平和战友们当机立断，决定将原定的上街示威游行活动改为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内进行。6月21日这一天，数百名留法学生和各界华人、华工，按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将大使馆团团围住。在指挥部的组织下，大家分头行动，分别封锁大门，将电话机等和外界联系的渠道切断，逼迫公使在声援国内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自由等几份文电上签字，并将这些文电分送有关单位和报社。同时还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张挂旗帜、标语，向行人和围观群众散发传单。在完成预定计划后，全体参加者又在法国军警赶到之前，全部安全撤离了中国驻法大使馆。

这是旅法华人在海外所取得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场斗争震惊了整个欧洲大陆，更使法国当局坐卧不安。法国政府当即下达了大规模搜捕和驱逐有反抗言行的旅法中国共产党人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命令。短短几天之内，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留法学生相继被捕，被驱逐回国。

邓小平作为一名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始终站在各项斗争的最前列。因而他很早就受到法国当局的注意，成为警方秘密监视和跟踪的对象。面对法国警方的严厉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丝毫的退却，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和勇敢投入新的斗争。仅从今天可以查到的几份法国警方的记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极其危险的情况下，邓小平是如何毫不畏惧地坚持工作的：10月24日主持在伊希——莫尔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举行的会议，内容是讨论重建中国共产

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重要性；11月15日主持纪念王京歧的会议，并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6年1月3日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政策、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法国警方在1月7日的报告中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不仅出席了1月3日的会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他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他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苏联和中国的信件。

鉴于这种情况，法国当局决定马上采取行动。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法国警方对邓小平等人所住的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朱勒费里街8号的三家旅馆采取联合行动，进行了突击搜查。

尽管这时天还未亮，四籁寂静，不少人还在香甜的睡梦中，但法国警方还是来迟了一步。他们将旅馆所有房间里里外外搜查了好几遍，但始终不见搜捕对象的半点踪影。最后警方只在邓小平他们所住的房间内搜得“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

法国警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年轻的旅欧党团负责人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傅钟等人，在此前一天，已机警地远走高飞，经德国到列宁的故乡去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邓小平在法国五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中，除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党团机关工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打工糊口。他的进入学校读书学习的夙愿想不到在列宁的故乡才得以实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躲过了法国警方的搜捕后，乘列车北上，途经德国，应召来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邓小平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创办的中山大学，接受正规的教育。

中山大学是一幢三层的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沙俄一个贵族的宅第。它在莫斯科当地尽管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当中，名气却很大。1921年苏联政府就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它除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干部外，还为印度、日本、越南、阿拉伯等东方国家培养干部。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同志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人就曾在这所大学学习。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大量干部。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中山大学遂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为国共双方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

当邓小平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隆冬的莫斯科，白桦树叶已纷纷落去，到处都是一片雪白的世界。银装素裹下的克里姆林宫犹如神话中的水晶宫，与红旗猎猎飘扬的宽阔红场遥相呼应，交相辉映。这里的男女老少是这样的意气昂扬和和蔼可亲，与不久前

法国警方的凶残、工头的吆喝叱骂和生活的困窘等形成了迥然而异的两个世界。邓小平从中强烈地感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与资产阶级专政的鲜明对比和天地之别。他心中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早日学成回国、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也由此变得更加强烈。

邓小平在学校领了一个编号为 233 的学生证，为了学习和工作上的方便，他还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罗佐罗夫。他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十分丰富，除俄语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 等等。每天学习的课时很多，主要采用先由老师讲解，然后学生提问、讨论，老师最后进行总结的方法进行授课。对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邓小平格外珍惜。他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过去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虽也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毕竟是“太粗浅”，因而“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原理的学习，使他获益良多。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有关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方面的课程。通过这些学习，邓小平不仅掌握了多种常规武器的使用，还初步接触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以及作战方法和战术的具体运用。这为他日后卓越的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山大学当时有学员三百多人，分为十一个小组，每个小